

■ 新作聚焦

温燕霞《破阵子》：

于无声处起惊雷 群像生辉映烽烟

□ 胡平

在抗战题材创作的庞大阵容里，温燕霞长篇小说《破阵子》可谓异军突起。它的别开生面，首先在于跳出了人们对这类创作的惯常认知，作品以文化抗战为核心主题，铺展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工作者在党的引领下开展英勇斗争的图景。作者能择取并深耕这一题材，更彰显出其独到的创作眼光。

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，处于极为特殊的历史环境：这里虽屡遭日军空袭，却属抗战大后方；虽是国统区，却设立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；以李宗仁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，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，暗中则多有提防；同时，这一时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，郭沫若、夏衍、巴金、丰子恺、欧阳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创作，将桂林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影响力推向鼎盛。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《破阵子》成功塑造出另一类抗日英雄群像：桂林的文化工作者们办报刊、开书局、印传单、组织文艺演出、转运文化物资，以宣传为武器奋起反击侵略者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，也让桂林这座抗战文化城为更多世人熟知。小说中的这支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，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；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，也经由这部文学作品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。

小说的主人公并非名人，而是扎根基层的文化人，其中有谢云深、月笼纱、张松韵等人。他们秉持社会良知，在山河破碎的危局中挺身而出、担当大义，为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。谢云深创办的《吼声报》拥有数以万计的订户，月笼纱带领的新声剧团、好孩子剧团演出达170余场，张松韵经营的书店传播了大量进步书籍。武汉沦陷后，风靡全国的抗战报刊与图书，大约有80%源自桂林。倘若说抗日战争的历史胜利，源于全社会的全方位立体动员，那么这群基层文化人，便在其中默默扛起了属于自己的一份责任。他们自觉且勇敢，是真正的民族精英，自登场起便赢得了读者的敬重。

人物塑造是小说创作的关键。温燕霞擅长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刻画人物，以情感纽带串联情节，展现人物性格的复杂侧面。书中，谢云深与月笼纱已是夫妻，二人的关系从开篇到结尾，始终扣人心弦。月笼纱本是为摆脱罗列的纠缠才嫁给谢云深，二人约定可随时解除这场名义上的婚姻。谢云深虽心生爱慕，平日里却只能与她相敬如宾。这般相处状态，难免让读者始终牵肠挂肚，想要知晓他们的最终结局。在后续的文化救亡运动中，二人彼此倾力相助，在朝夕相伴中了解到对方的品性，更深感彼此志同道合，最终成为心意相通的同志与夫妻。月笼纱终于将自己的枕头，真正铺在了属于二人的婚床上。这样的情节设置颇为巧妙，作者深入描摹二人的爱情纠葛，让故事形成强烈的戏剧张力，又在夫妻相处的点滴间衬映出民族危亡之际的人生大节，读者也在不知不觉的情节追寻中，真切感受到了那个特殊时代的浓厚氛围。陈星汉与张松韵这对夫妇也值得一提。陈星汉是知名出版家，党的地下工作者，二人因此貌合神离。这一极具张力的情节设计，让读者不由得时刻关注后续发展。此后，历经曲折的求证，真相终于水落石出：陈星汉曾遭日谍设计骗服迷幻药，致使记忆受损、精神失常，方才做出这些无心之举，其内心也始终备受煎熬。



最终陈星汉英勇牺牲，张松韵也陷入无尽的悔痛。这对夫妇的经历极为深切地反映出，抗日战争时期复杂的生死较量时刻考验着革命者的奉献精神，既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，也让人由衷敬仰这对文化人对理想的坚守。

《破阵子》的另一大亮点，在于悬念式人物的设置。小说中诸多人物的面目并不明朗，一时难以让人看透，引得读者心生诸多疑问，也显著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。当然，这样的写法也与作品中各类社会矛盾暗藏、随时可能激化的时代背景相契合。小说中最充满悬念的人物当属表面上身为国民党上尉秘书的“唐虎”。他在“行营”负责教育、出版、文艺等方面的工作，常与谢云深等人打交道。令人诧异的是，他的相貌与谢云深早已牺牲的兄长谢白水极为相似，但他却声称与谢家毫无渊源。“唐虎”实为中共地下党员，周遭满是猜忌的目光，还需不断躲避特务部门的怀疑，暗中开展诸多工作：助力解封《吼声报》与星汉书店，将共产党的游击战、持久战理论融入桂系军队的日常操典，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。直至小说结尾，作家才揭开谜底：他本名并非“唐虎”，而是谢白水。当初被安葬的是一位与他长相相似的烈士。为完成使命，他长期隐姓埋名，与亲人咫尺天涯、不得相认。作者埋下的诸多伏笔，让这位文化战线上的关键人物备受读者关注，也塑造出地下工作者隐忍坚毅的独特形象。王俊曾任派出所所长，因贪腐案被捕，主动请缨奔赴前线抗击日寇，在战场上立下二等功。但是，此后他却成了桂林行营政治部的爪牙，专门监视文化界，查封进步报刊与书店。

温燕霞长篇小说《破阵子》以文化抗战为核心主题，铺展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工作者在党的引领下开展英勇斗争的图景。小说中的文化抗战力量虽未直接与日寇兵刃相接，却有着抵得上千军万马的精神力量。他们在无声处铸就的不朽功绩，也在书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与展现

当日军兵临桂林城下时，他又主动报名参战，以敢死队员的身份留下遗言，以自己的性命与日本敌寇抗争。这一人物面目多变、善恶交织，让人捉摸不透，但在故事结尾他守住了民族大节。这个角色的塑造跳出以往同类小说的固有范式，读来令人印象深刻，也让读者对其渐生浓厚兴趣。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刻画贴合现实，生活中本就不乏这类复杂多面、难以简单定论，却可能做出意外之举的人。将这类人物置于最考验人性的历史境遇中，定格其耐人寻味的人生轨迹，既可见作者对人性的独到观察，也彰显出其不俗的文学创作理念。此外，关于其他一些人物，如罗列是不是间谍、杜滨身后有何种背景、杨飞龙属于哪个阵营、钱再峰真实立场如何、欧阳美浓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等，都富有悬疑色彩。温燕霞是个善于营造叙事“黑洞”的作家，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，尤其是由模糊到清晰的浮现，也重视渲染出历史的迷雾，尝试在迷雾的破解中揭示历史的真相。这些努力都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。

抗战中的文化题材并不容易处理，常被写得流于概念，又缺乏行动力量，温燕霞却能在创作这类题材作品时推陈出新，可谓难能可贵。这部新作与《红翻天》《琵琶围》《凤凰飞》等作品相比，拓宽了新疆域，探索了新风格，展现出她多面的才能和广阔的前景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部主任）



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
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

■ 创作谈

人与人之间有缘分，人与地方之间也有缘分，比如我和广西就很有缘。2002年，根据我的长篇小说《夜如年》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国屋里的女人》在广西黄姚古镇拍外景，我受邀前去探班，感觉贺州的风土人情与我老家赣南非常相似，因此对广西多了几分亲切之情。回程时，我专程去了桂林，被那片如画的美景所陶醉，并生出恨不长作桂林人的念头，但也仅是一闪念而已。没有想到十多年后，我会与广西的出版界有这么紧密的合作，先是在接力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《虎狼》和《凤凰飞》，后来又创作了反映文化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《破阵子》，让我有机会开拓了新的创作领域，同时也面对新的挑战。

《破阵子》的创作对我而言有小小的难度，因为要写的是一个陌生的领域。虽然我在大学时便对桂林文化抗战的这段历史感兴趣，之后几次去桂林，都曾专程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参观。为了写这本书，更是多次去桂林深入生活，翻阅过近百本参考书，史料非常丰富，但也因此陷入了“选择困难症”，后来经过跟出版社和责编的多次沟通，这才厘清了思路，确定了写作方向。

但这次的创作毕竟不像以前写赣南题材的小说那样，风俗民情、细节等可以信手拈来，我在享受陌生题材带来的新奇感的同时，也在承受着由此带来的困扰——大纲的构思还算顺畅，可下笔细写时却经常卡壳，归根到底，我对人物生活的桂林不熟悉，我的经验都是间接的。为此，出版社请当地的党史专家和民俗专家给我释疑解惑，在初稿完成后，不但组织改稿会，请专家提出修改意见，还安排我去桂林再次进行补充采访。这次我是带着问题去的，结果精准而有效，对之后的改稿大有裨益。即便如此，有些细节要写准确，还得临时请教编辑和当地的党史专家。那段时间，我和出版社编辑及当地的党史专家经常保持着热线联系，作品的打磨也浸润着出版人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。

《破阵子》一书出版后，有记者问我，作为一个江西人，为什么要写反映桂林文化抗战的长篇小说？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？作家写熟悉的题材容易出彩，深挖一口井更容易形成作家风格的鲜明标识，但我也觉得作家不能完全被地域和题材所局限，有时陌生的领域、陌生的题材反而能给我带来更加强烈的创作冲动，会迫使我主动学习，以此来战胜陌生导致的无知，同时更加用心地深入生活。这种过程，就像用一柄坚硬的镐头，在冻土上掘一口井，费心费力费神，可一旦进入了人物的内心，又会有一种奇异的幸福感，好像我跋涉了千里万里，终于走到了亲人身边一样。《破阵子》的创作就给我带来了这种幸福感。作品的创作初衷很简单，我想借助这本以桂林为人生生长土壤，以文化抗战为故事背景的小说，给读者们打开一扇通往桂林文化抗战史的窗口，让读者，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了解到，抗战最困难的时期，在广西桂林，有那样一群文化人，他们毁家纾难，以笔为戈，以文为矛，以戏当鼓，以歌为号，尽己所能地唤醒国人的抗战意识，从而使大家拧成一股绳，齐心协力地抗击日本侵略者。同时也是希望给读者提个醒：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国度，但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。在世界形势波诡云谲的情况下，如果忘记过去，就可能放松警惕。只有警钟长鸣，才能让我们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站稳脚跟，守住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安宁。

当然，囿于才华和能力，我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但身为作家，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。

用一柄坚硬的镐头，在冻土上掘一口井

□ 温燕霞

■ 评论

中国职业教育出海的壮丽画卷

——读狄青长篇纪实文学《鲁班出海——鲁班工坊建设纪实》

□ 李春雷

天津作家狄青在文坛耕耘多年，以小说、散文与评论见长，堪称名副其实的杂家。如今，他驶入纪实文学的广阔海域，凭《鲁班出海——鲁班工坊建设纪实》（以下简称《鲁班出海》）完成了一次文学远航。为打磨这部作品，他倾注了三年心血，从天津的职业院校到非洲的实训基地，从资深教师到异国学生的足迹遍布各地。扎实的采访、调研，让作品既保有史志的严谨，又饱含文学的温度。

狄青的写作在承袭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同时，又在浓郁的津味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语言风格。在他笔下，严肃的文学题材也能鲜活灵动，透着满满的生活气息。鲁班工坊，这个以中国古代工匠祖师命名的国际合作项目，始于2016年春天。从此，这个承载中国工匠精神的国际品牌，开启了走向世界的航程。

截至2025年11月，鲁班工坊已在全球31个国家建成35座，开设工业机器人、新能源、智能制造等70多个专业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。在非洲吉布提，鲁班工坊为这片战略要地带去急需的先进职教模式，中国教师克服高温缺水的艰苦，将先进铁路技术传授给当地青年；在葡萄牙，学员专注研习工业机器人技术，斩获国际技能大赛银牌；在哈萨克斯坦，第二届鲁班工坊依托天津职业大学人工智能专业优势，开展学历教育与技术培训；在巴基斯坦，学生乌马尔赴天津学习后感慨：“世界仿佛变小了，而我们的舞台更大了。”这些跨越山海的教育合作场景，

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成功出海的见证。

作为一部以文学形式系统记录鲁班工坊发展历程的作品，《鲁班出海》有着独特价值。本书以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篇，以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建设为主线，尽显中国职业教育的全球视野。狄青在书中深刻阐释了“班墨文化”的精神内涵，通过翔实案例与生动细节，让读者看到“班墨文化”承载着中国工匠执着专注、精益求精、敬业守信、不畏艰难、勇于挑战、超越自我、推陈出新的精神。这些品质，正是鲁班工坊传递的核心价值。

鲁班工坊的全球拓展，离不开天津的坚实支撑。这座城市不仅是鲁班工坊的发源地，从首批试点到全面推广，天津更为工坊建设提供了全方位支持。为何选择天津？狄青在书中以大量事实与数据给出答案：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，其领先地位源于“历史积淀、政策红利、产业需求、创新实践”的良性循环。这座工业底蕴深厚的城市，在职业教育发展上有着天然优势。天津的成功还在于将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、产业升级深度绑定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天津模式”。这一模式不仅涵盖了先进教学理念与课程体系，更包含了师资培训、实训基地建设、质量评估等完整体系。

在《鲁班出海》中，狄青巧妙融入天津独特的地方元素：五大道的小洋楼诉说城市历史，古文化街的喧嚣彰显市井活力，“天津之眼”的璀璨象征发展脉搏，耳朵眼炸糕、十八街麻花的香气，成为书中生动的背景。这些充

满烟火气的描写，让读者感受到鲁班工坊背后深厚的文化根基。

《鲁班出海》既记录过往成就，更展望未来方向。随着全球制造业向高端化、智能化转型，鲁班工坊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。未来的鲁班工坊将更注重对接当地产业需求，突出数字化、智能化技能培训。

中国职业教育将持续为世界贡献“中国方案”，不是简单的技术输出，而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合作模式；不是单向的知识传授，而是双向的文化交流；不是短期项目，而是着眼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实践。

狄青的《鲁班出海》不仅是一部纪实文学，更是时代发展的文学见证，让读者看到中国工匠精神正借助鲁班工坊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，中国职业教育标准正通过这一平台逐步获得国际认可，中国文化理念正经由这个窗口走向更广阔的世界。

作家以真挚情感、生动描写与严谨态度，为我们展开一幅中国职业教育出海的壮丽画卷。在这幅画卷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传播，更是文化的交融；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出海，更是中华文明的远航。通过《鲁班出海》，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开放、自信的中国，正以教育合作为纽带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。这或许正是这部作品最珍贵的价值。它记录的不只是一个项目的成功，更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坚实脚步，一个文明传承创新的生动实践。

（作者系河北省作协副主席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）

潘灵中篇小说新作《半农兴农记》真实地反映了乡村振兴历史进程中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。文化自信和精神价值与物质生产和经济指标同样重要。随着中国农村近年来产业化的快速推进，新山乡巨变给农业、农村与农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，解决乡村精神贫困的朝阳已经升起。

小说的主线非常清晰，罗半农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做村主任助理，初步适应乡村工作，在与村干部、手艺人 and 村民的交往过程中得到启示，形成改变故乡落后面貌的思路与方案，推动传统陶瓷与现代网络结合，促成虎窑村与龙窑村合作发展陶瓷产业。小说开篇，罗半农来到他从未进入过的老宅，面对一片萧条与荒芜，心中感到恐惧。小说结尾，罗半农将母亲珍藏的“福”字帖回老宅，决心重建老宅，首尾形成闭环，暗示精神重建才是根本。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不仅能改变家乡的面貌，也消除了他“无根”的精神困惑。

罗半农从迷茫、困惑，到积极投身家乡的陶瓷产业发展，有其生活的逻辑。他与村主任的冲突，象征着接受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大学生与传统观念的冲突。陶瓷事业与网络的联姻，是新农村产业发展的正在发生的大事，也预示着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。潘灵写的故事，以故乡巧家县正在进行的农村产业化发展为基础。巧家县曾经属于“乌蒙山深度贫困地区”，是国家级的“特困县”，近年来农村的产业化发展蓬勃展开。贫穷、苦寒的故乡发生了根本性改变，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作品既塑造了罗半农、刘劲等典型人物，其他配角人物如费老么、罗四、壶娃、许大、许二等也个性鲜明。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，罗半农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。小说描写了他从迷茫、困惑最终走向成熟，坚守理

对“根”的追寻

——读潘灵中篇小说《半农兴农记》

□ 宋家宏

想，投身乡村振兴的性格变迁史。他是夹在城乡裂缝中的一代人的典型，他的返乡之旅先是不得已的工作，后成为一场寻找精神家园和确认自我价值的旅程，深刻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大量“半农”群体的普遍境遇。虎窑村虽然是罗半农的故乡，但他的出生与成长都与这里无关。“农民工二代”是他的身份，他是半个农民，也是半个城里人，处于夹缝之中，既融不进城市，也找不到故乡。他曾想逃离这强加于他的“故乡”，但内心深处还有一份浪漫情怀，他热爱诗歌，二舅为他取的姓名与诗人刘半农同名异姓，使他产生了对文学的向往与追求。正是这一份浪漫情怀，推动他从迷茫中走出来，从幼稚走向成熟。身份焦虑、工作挫败并没有使他屈服，年轻人的朝气与抱负、理想主义的热情作为强大的内驱力，促使他积极推动“互联网+”陶瓷产业化发展，为村民寻找新的致富途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隐忍化为坚强，克服重重阻力，不断吸收乡村工作的营养，成长为一个有担当、有能力的乡村基层干部，从一个精神上“无根”的漂泊者，成长为乡村振兴的“建设者”。

作品结尾，龙虎两村共建的陶瓷园开建，村主任刘劲投入共建行列，罗半农决心重建老家家园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，因为园区的建设未来还可能遇到相当多的困难。但这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，给读者以阅读的期待，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。可以说，《半农兴农记》是一部关于“根”的追寻、关于“振兴”的实践、关于“人”在时代变迁中寻找位置 and 价值的动人故事。富于个性的人物性格塑造、生动的细节描写，真实而艺术地再现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复杂性、艰巨性和希望所在。（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）